

东汉皇室的史学情结

□ 曲柄睿

中国古代有才略的帝王，往往表现出对历史的尊重。

唐太宗的千古名句，“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。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。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，体现了古代帝王知史知人的情怀。宋太祖诏修《五代史》时指出，“唐季以来，兴亡相继，非青编之所纪，使后世何以观……将使垂稽模于百代，必须正褒贬于一时”，传达了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信息。由于唐宗宋祖的提倡，唐宋成为中国传统史学昌明的时代。如果向前追溯，可以发现古代帝王关注史学、提倡治史、以史为鉴，最早是从东汉时期开始的。

对记史修史的重视

不仅仅是帝王，包括后妃、诸王在内的整个东汉皇室，特别是早期东汉皇室，都表现出浓厚的史学情结。他们关心史书修撰，亲身参与历史撰述，推动了史学的发展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注重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经验，促进了国家的政治清明与社会繁荣。

早期东汉皇室对史学的关注始于光武帝刘秀。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，刘秀就注意搜集各地历史信息。袁宏《后汉纪》称光武帝“每幸郡国，见父老掾史，问数十年事，吏民皆惊喜自令以见识，各尽力命焉”。查访历史信息，成为沟通 and 团结地方人士的重要途径。

刘秀通过修撰郡国书笼络地方豪强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称“后汉光武，始诏南阳，撰作风俗，故沛、三辅有昔日节士之序，鲁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”。这项工作，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后代修撰方志的起源。光武帝刘秀特别关心西汉统治中三辅地区的历史风俗，经常向三辅地区出身的官员询问长安旧事，作为治国参考。范曄《后汉书》记载，出身扶风的马援，擅长讲述西汉历史掌故，“每言及三辅长者，下至闾里少年，皆可观听。自皇太子、诸王侍闻者，莫不属耳忘倦”。受到光武帝影响，此后的汉明帝、汉章帝莫不重视搜集三辅地区的历史资料。

东汉官修国史的修撰，来自于汉明帝刘庄的授意。而后代东汉皇室的关注和支持，保证了国史修撰工作的持续。

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记载，汉明帝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，令他与前睢阳令陈宗、长陵令尹敏、司隶从事孟异共完成记载刘秀事迹的《世祖本纪》。而后，班固又撰写了功臣、平林、新市、公孙述等人物的列传、载记共28篇。汉章帝刘烜时期，正式确定在洛阳南宫收藏皇家图书的东观组织修史工作。汉安帝永宁元年，邓太后令于东观校书的刘珍、刘毅等人编写建武以来名臣传、中兴以下名臣烈士传等传记。刘知几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称这次修史的内容包括“纪、表、名臣、节士、儒林、外戚诸传”，内容丰富，总括光武帝至汉安帝以前的史事。这时，东汉国史的名称定为《汉记》。

汉桓帝刘统统治期间，虽然国政昏乱，但东观修史的工作并未荒废。伏无忌、黄景、崔暹、边韶、延笃等大臣先后在东观修史。他们完成了《诸王子功臣恩泽侯表》《南单于传》《西羌传》《地理志》，孝穆、孝崇二皇、顺烈皇后、安思皇后等传，以及《百官表》和顺帝功臣孙程等人的传记。至汉灵帝刘宏熹平年间，马日磾、蔡邕、卢植、杨彪、韩说等人在东观继续修撰《汉记》。汉献帝刘协播迁许都，杨彪仍坚持续补《汉记》。

大约在6世纪初，这部于东观修撰的国史被称为《东观汉记》，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。《东观汉记》作为东汉国史，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。直到唐代，它一直与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并称“三史”，是统治者汲取历史经验的重要参考。《东观汉记》的完成，与东汉皇室重视历史、重视史书修撰密不可分。

高超的史学修养及运用

东汉皇室参与到修撰史书的工作中，干预史书的内容和体例。在此过程中，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意识和文化素养。

汉明帝的马皇后平日好学，史称“能诵《易》，好读《春秋》《楚辞》，尤善《周官》《董仲舒书》”。汉明帝驾崩后，马太后亲自参与了《显宗起居注》的修撰工作，删去了自己兄长马严在明帝病重期间照顾饮食医药之事。即位的汉章帝表示不解，为马严辩白。马太后解释说：“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，故不著也。”正是出于对后世评价的考量，皇室对

历史修撰的选材颇为重视。

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，同样雅好典籍，他以为班固《汉书》卷帙浩繁，不易观赏，特命荀悦将纪传体的《汉书》仿照《左传》体例，删改成编年体。后来形成《汉记》三十卷，史称“辞约事详，论辨多美”。荀悦在《汉纪》的序文中指出，本书的创作基于五个目的，分别是“达道义”“章法式”“通古今”“著功勋”和“表贤能”，体现了史学家的志业与良知。荀悦能够实现如此事业，与汉献帝“惟文之恤”的关怀密不可分。

在现实政治活动中，史书还成为东汉皇室凭借的某种政治信物，发挥独特的作用。光武帝为笼络地方割据势力窦融，特以外属图及太史公《五宗》《外戚世家》《魏其侯列传》相赠。汉和帝欲诛杀窦氏时，私下通过清河王刘庆求取《外戚传》，以作参考。如果不是在日常生活中熟悉历史及史书，则仓促之间断难如此行事。

早期的东汉皇室重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，作为当世政治之戒。

西汉亡于王莽，肇端却在成帝。汉成帝大封外戚，舅舅五人同日封侯，此后相继当轴用事，西汉皇权逐渐旁落。东汉皇室每每以此为戒，严防外戚掌握过多权力。汉章帝即位之初，想要分封马太后诸兄弟，太后不许。她援引西汉成帝及早的武帝时分封外戚导致国政昏乱的故事，所谓“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，其时黄雾四塞，不闻澍雨之应。又田蚡、窦婴，贵宠横恣，倾覆之祸，为世所传”。而后，马太后又举汉明帝不欲大肆分封自己诸子的近代例证，说明谦退实为本朝成例。但是，这些例子并没有说服汉章帝。马太后又援引汉景帝时，窦太后欲分封王皇后之兄，被条侯以“高祖约，无军功，非刘氏不侯”拒绝的史实，再次回绝了汉章帝的要求。马太后总的理由是：“岂可上负先帝之旨，下亏先人之德，重袭西京败亡之祸？”人情莫一再拒绝章帝之请，归根结底，在于她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。正因为如此，马氏一族在东汉颇得善终，不似其他跋扈的外戚之家踵继败亡。

汉末史学意识的进一步兴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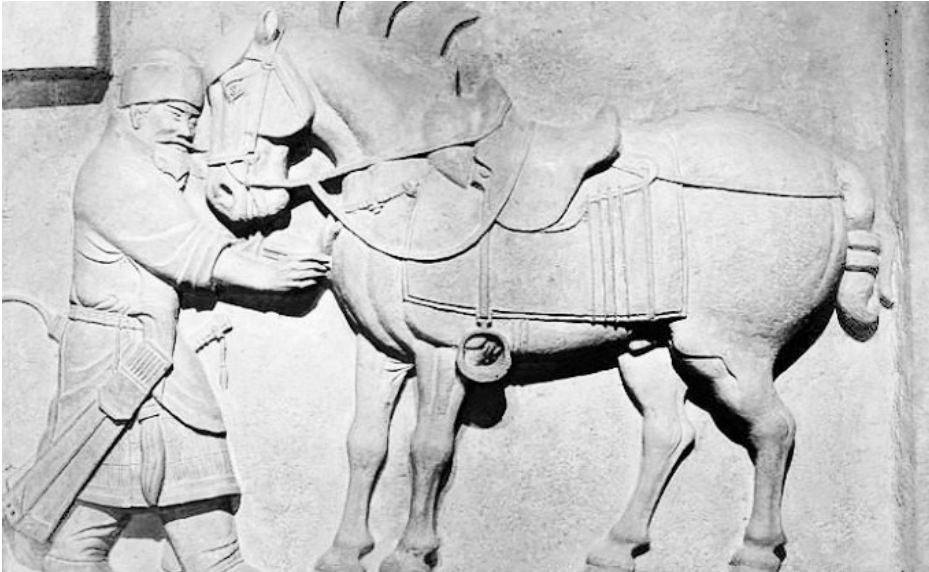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随着天下承平日久，东

汉皇室逐渐走向下坡路。在早期皇室代表汉光武帝、明帝、章帝以及马太后身上那种惟日孜孜、无敢逸豫的勤政作风，以及以史为鉴、观古察今的史学意识，逐渐被奢靡、自大的狂妄态度取代。东汉汉中后期的皇室，除了少数人，逐渐丧失了对历史经验的重视。从汉安、顺帝以后，外戚专权，宦官干政，股肱之臣蒙受非罪，清流之士隐遁山林，东汉政局一片黑暗。东汉政治的失败，反而成了后来者的历史教训。

有学者指出，汉魏之际，人们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，理由就是人们迫切从历史中，特别是近代史中总结经验教训。汉末开创天下三分基业的刘备和孙权，就是其中典型。诸葛亮《出师表》载：“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颓也。先帝在时，每与臣论此事，未尝不叹息息痛恨于桓、灵也。”叙述的正是刘备君臣之间讨论历史经验的事。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裴松之注引《诸葛亮集》，载刘备遗令后主刘禅，“可读《汉书》《礼记》，闲暇历观诸子及《六韬》《商君书》”，将历史摆在首位。《三国志·吴志·吕蒙传》裴松之注引《江表传》，记孙权建议吕蒙多读书，以“涉猎见往事”。孙权以自己为例，所谓“少时历《诗》《书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”，统事江东以来，又“省三史、诸家兵书”，以为“大有所益”。其中的“三史”前文已经提及，主体部分就是汉代历史。

刘备和孙权作为乱世枭雄，重视历史经验，当然是希望为现实政治提供帮助。而作为近史的东汉历史，无疑是他们瞩目的焦点。孙权还曾希望太子孙登读汉书，“习知近代之事”，就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期望。东汉政权经历创业艰难而繁盛，盛极而衰走向灭亡的历史过程，自然为刘备、孙权等人所迫切关注；而伴随东汉王朝从兴起到灭亡的东汉皇室，对待史学的不同态度，同样也会成为历史的晨钟暮鼓，时刻萦绕在每每以这段历史作为参照者的耳畔。

史 镜



历史上强大王朝的君主都喜欢骏马。与汉武帝一样，唐太宗李世民也酷爱骏马，他的《饮马长城窟行》一诗说：“塞外悲风切，交河冰已结。瀚海百重波，阴山千里雪。迴戍危烽火，层峦引高节。悠悠卷旆旌，饮马出长城”，充满了英雄气。在太宗眼里，马不仅是国力的体现，是国防的重要武装，马还见证了他辅佐其父平定四海、南征北战的生涯。

唐太宗屡战屡胜，因为拥有一支精锐的骑兵部队，骑兵选用的战马多来自于西北的游牧地区。《旧唐书·北狄传》：“骨利干北距大海，去京师最远，自古未通中国。贞观中遣使来朝贡……俄又遣使随苏密使人朝，献良马十四。太宗奇其骏异，为之制名。号为十骥：一曰腾霜白，二曰皎雪骠，三曰凝露骠，四曰悬光骠，五曰决波瑜，六曰飞霞骠，七曰发电赤，八曰流金骠，九曰翱翔紫，十曰奔虹赤。”骨利干，敕勒部落之一，居安加拉河至贝加尔湖以南，世代出产骏马。太宗亲自为马一起名，足见他对马的重视。太宗赞赏的骏马，一有体型骨相之美，二有毛色之美，三有超常的速度。

“十骥”之外，唐太宗最著名的战马就是“昭陵六骏”。昭陵是太宗的陵墓，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城东北的九嵛山上，是陕西关中“唐十八陵”中规模最大的一座。贞观十一年（637年），太宗命令把他征战所骑的六匹战马雕刻在昭陵以纪功，由著名画家阎立本画图起样，良匠用六块青石板刻成高浮雕，每块高约172厘米、宽204厘米，是典型的纪念性雕塑。“六骏”分两列东西相对地放置在唐太宗陵前，马头均朝向南边的陵寝。从南向北，西侧依次是“飒露紫”“拳毛騧”“白蹄乌”，东侧依次是“特勒骠”“青骢”“什伐赤”。太宗亲作《六马图赞》，由欧阳询书写，以表达对“六骏”的怀念之情。太宗的图赞以精练的语言评价了自己所乘战马的特点。“六骏”均为“马之良才”，是从西域波斯马种群中精选出来的；“六骏”刚毅神俊，骁勇善战，出生入死，临危不惧，像六位歷經沙场、屡建奇功的战斗英雄。“六骏”象征了太宗一生所经历的最主要的六大战役。

“六骏”中“什伐赤”产于波斯，波斯称马曰“什伐”；“特勒骠”产于突厥特勒，特勒是突厥常用的一个官衔。葛雍雅先生认为：“六骏”均来源于突厥语，如“飒露紫”意为“勇健者的紫色骏马”；“青骢”意为“来自西方大秦的骏马”。“六骏”中三匹做奔驰状，三匹为站立状；“六骏”中有四匹中箭，少则一箭，多则八箭。“六骏”的鞍、鞵、镫、缰绳等，都逼真地再现了唐代战马的装饰。“六骏”石刻以形传神，形神结合，真实简练地表现了隋唐之际重型骑乘马的形神特征：头长腰短，眼大眸明，筋粗骨细，腕促蹄高，既有悍威、速度、耐力兼备的体魄，又有冲锋陷阵、勇往直前的品质。无论是忍痛拔箭的“飒露紫”，中箭犹自从容的“拳毛騧”，还是带箭飞驰的“什伐赤”、“青骢”，都把人们带回到那个剑戟林立、矢伐如雨的古战场。

在“六骏”中，关于“飒露紫”的记载最为具体生动，事迹见《旧唐书·丘行恭传》。李世民讨伐隋末割据者之一的王世充，在夺取洛阳邙山一战中，李世民与随从失散，当时仅有侍臣丘行恭跟随，李世民所骑的“飒露紫”中箭，丘行恭挡住强敌，下马为其拔箭，“飒露紫”前腿挺立，身躯微向后倾，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配合拔箭，表现了危难中人与马的深厚情谊，场面生动感人。丘行恭将自己所骑的马让给李世民，然后徒步与敌人作战，突围而归。因其战功卓著，丘行恭死后陪葬昭陵。“六骏”石刻中唯一有人物形象的，就是丘行恭。

“六骏”石刻是一个沙场驰骋的英雄时代的象征，晚唐李商隐《复京》的“天教李令心如日，可要昭陵石马来”，韦庄《闻再幸梁洋》的“兴庆玉龙寒自跃，昭陵石马夜空嘶”，对“六骏”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精神表达了无限的追怀之情。李贺《马诗二十三首》其十六赞美“拳毛騧”：“唐剑斩隋公，拳毛属太宗。莫嫌金甲重，且去捉颶风”；苏轼有五言古诗咏赞“昭陵六骏”应时而生：“天将铲隋乱，帝遣六龙

唐太宗与「昭陵六骏」

□ 高建新

来。森然风云姿，飒爽毛骨开”，同时赞美了唐太宗的叱咤风云、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。

“昭陵六骏”是驯马史上的奇迹，也是骑兵史上的奇迹，赢得了历代诗人的羡慕和赞美，元代诗人张昱《唐太宗骏马图》一诗咏赞了唐太宗的非凡功业及“昭陵六骏”的神勇无比、济危救艰：

昭陵石刻今无有，绢素乃能存不朽。当时奇骨济时艰，驾驭尽入天人手。隋家再世俱凡庸，不知肝膈生英雄。晋阳奋起六骏马，蹴踏人海波涛红。帝王一出万邦定，干戈四指群小空。凌烟勋臣尽图画，一旦青遗汗血功。呜呼何从得此样，规模却与石刻同。乃知帝王所取是龙种，岂可求之凡马中？唐家开基三百载，展卷尚觉来英风。

张昱看到的虽然是绢画，但画中展示的马的雄姿英发丝毫都不亚于石刻的“昭陵六骏”，这些号为“龙种”、来自西域的汗血宝马见证了大唐基业的开创。早在晋阳起兵时，它们就已经伴随在秦王李世民的身边。金世宗朝画家赵霖有《昭陵六骏图》，以宋刻“昭陵六骏”浮雕石刻拓片（今存陕西省礼泉县昭陵博物馆）为本，既忠实于石刻原作的风貌，又发挥出了绘画的特长。画中的骏马，鬃毛飞扬，肌肉劲健，嘴鼻、眼睛刻画细致，形象栩栩如生。“六骏”图还原了丘行恭像及其为“飒露紫”拔箭的景象。赵霖参酌了唐代韩干画马的技法，描绘柔和勾细，设色浓重沉稳，“六骏”的造型朴拙饱满，将石刻硬朗简洁的艺术风格转变为精致细腻的绘画语言，使人追想“六骏”驰骋战场的勃勃英姿。原画为设色绢本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“昭陵六骏”是唐代留存下来的最为精美的石刻，线条简洁有力，造型栩栩如生，充分发挥了浮雕特有的表现力，是印证初盛唐时期阳刚壮美的审美取向不可多得的实物。鲁迅先生认为，唐王朝的宏放，从昭陵上“刻着带箭的骏马”身上，也可以见出一斑，“简直前无古人”（《看镜有感》）；梁思成先生说：“唐代陵墓雕刻，尤有足述者，则昭陵六骏是也”。可惜的是，“六骏”中的“飒露紫”和“拳毛騧”两石，于1914年（一说1915年）被不法商人凿成碎块盗运出国，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。2017年1月，中国西安昭陵博物馆发文呼吁美国宾大博物馆归还昭陵二骏。“六骏”中的其余四石也被打碎，在盗运时被当地民众截获，现藏于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。近人连横《关中纪游诗》（其十二）咏叹此事：“战罢归来血尚红，东西驰骤逐群雄。昭陵六骏今亡二，片石犹铭讨伐功。”石刻的“昭陵六骏”，记录的是唐王朝建立的历史，谱写的是一曲壮丽的英雄凯歌。

二战中昆虫学家的功绩

二战时，一位名叫施万维奇的苏联昆虫学家利用蝴蝶伪装的原理，发明出比德军更先进的伪装技术，为苏军战胜纳粹德军立下大功。

1942年冬天，苏军正与纳粹德军鏖战，苏联高层几乎每天都要在克里姆林官召开军事会议。有一天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会议上抛出了一个将军们意想不到的议题：伪装。

当时，苏军的军装十分简单，冬天穿白色厚长袍装，夏天穿绿色军装，基本上起不到伪装的作用。而德军的军装就复杂了许多，他们身上带有斑点和条纹的“三色迷彩服”让苏军在远距离条件下很难分辨。不光是军装，德军的机场和坦克也都如此处理，苏军轰炸机飞行员在空中甚至无法准确分辨其机场的位置，一次次无功而返。

斯大林用电话听筒敲打着桌面，命令将军们一定要想办法研究出比德军更好的伪装手段。将军们都沉默不语，没人愿接这个“烫手的山芋”，都怕斯大林到时抱怨研究进展太慢，那么接下这个任务的将军就要倒霉了。斯大

林正要发作，一位年轻的将军出声了：“我认识一位列宁格勒大学的昆虫学教授，他曾经是那所大学昆虫学系的主任，这个系在几年前被撤销了，他专门研究蝴蝶的保护色和伪装手段，或许他能完成这个任务。”

这位年轻的将军还想补充一些什么，但斯大林大手一挥，说道：“不用再说了，他在哪里？马上把他找来，要快！最好今天就把他找来！”

斯大林的命令让年轻将军马上行动了起来。很快，电话就打到了萨拉托夫，列宁格勒（今圣彼得堡）被德军包围之前，列宁格勒大学被全体转移到了那里。但是学校方面仔细查了转移名单之后告知莫斯科方面，施万维奇没有跟随学校转移到萨拉托夫，而是留在了列宁格勒。

这下麻烦了，因为当时列宁格勒正被德军围困，已有大批民众饿死。天知道那个施万维奇是不是还活着，更何况几乎没有办法进到城内。

年轻将军沉吟片刻，当即决定，派人进城！一切都十分神速，仅仅20分钟后，飞机和特别行动

队就准备停当了。年轻将军向队员们简单介绍了任务，特别强调一定要保证施万维奇教授的生命安全，然后下令起飞。飞机升空后，冒着被德军炮火击落的危险，飞向被纳粹包围的列宁格勒。

万幸的是，飞机真的飞进了列宁格勒。队员们马上开始寻找施万维奇教授。经过多方探访，他们在一所破旧公寓的房间里发现了施万维奇。当时，这位教授已同城里的大多数人一样，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

队员们二话没说，直接将教授抬上了飞机，然后起飞，再次冲破德军空中封锁线，向莫斯科飞去。在飞机上，施万维奇喝下队员们准备的鸡汤，慢慢恢复了过来。

夜里，施万维奇教授被送到了斯大林身边，这距离命令下达只有几个小时。斯大林打量着施万维奇那张消瘦的脸，问道：“教授，你能帮助军队解决这个难题吗？”施万维奇清楚这个难题是什么，队员们在飞机上已向 he 讲述了一切。心里有数的教授坚定地回答：“我能！”斯大林听了很高兴：“那么需要为您准备什么呢？